

#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

古为明

---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共产党倡导,国共合作,有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中国妇女界的救亡团体,八年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万名战时难童。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为民族培育了未来。本文对这一段历史做一简要的叙述。

**关键词** 战时儿童保育会 救助难童 保育事业

---

##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成立

1937年底,侵华日军已攻占华北、华东大片领土。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灾难,千万难民流离失所。而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处境尤为悲惨,他们或是死于敌人的炮火下,或是倒在饥饿贫病的逃难途中。更有一批儿童被日军掠走,送往台湾、朝鲜以及日本,施以奴化教育,甚至有的被抽取鲜血,输给日军伤兵。<sup>①</sup>

面对残暴的敌人,苦难的儿童,中国妇女界首先行动起来。当时成为抗战临时指挥中枢的武汉汇集了一批国共两党以及无党派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她们为抗战救亡,拯救难童积极活动并付诸行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先后有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的座谈会和《妇女生活》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邀请妇女界爱

---

<sup>①</sup> 曹孟君:《救救孩子们》,《妇女生活》第5卷第9期,1938年3月。

国人士参加,讨论抗战期间妇女问题。前者由女青年会总干事陈纪彝和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主持,后者由“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主持。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组成员的邓颖超、孟庆树多次参加座谈会。邓颖超在会上就妇女工作和难童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中共党员、公开身份为电影女演员的陈波儿首先在女青年会的座谈会上,提出赶快到各战区去抢救难童的建议,得到大家的拥护。<sup>①</sup>与此同时,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女党员曹孟君、安娥、徐镜平、朱涵珠和刘清扬、杜君慧等人也互相联络,多方奔走,筹划尽快抢救难童。她们的想法立即得到了邓颖超的支持,邓颖超指示说: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sup>②</sup>

妇女界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赞同。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首先报道:“抗战以来,很多为国牺牲的同胞遗下儿女无人照顾令人怜悯。为了救济这些儿童,社会上正准备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

1月20日,《妇女生活》发表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所写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呼吁“爱国爱民族的同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同完成这个保育中国幼年主人的任务;为我们阵亡将士,死难的父老兄弟姊妹和儿女报这血海似的冤仇!使他们虽未得享受自由解放于生前,但能安慰于壮烈牺牲之死后!”在这一期《妇女生活》上,还列出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首批发起人名单。在各方共识合作的基础上,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推选李德全、郭秀仪、钟可托、安娥、唐国桢、

---

① 李文宜:《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片断回忆》,《李文宜纪念文集》,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248页。

② 徐镜平:《回忆战时儿童保育会》,《抗日烽火中的摇篮》,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239页。

吕晓道、于汝州、朱涵珠、曹孟君九人为筹备委员，李德全为主任委员。此后筹备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邓颖超继续推动发起人签名，沈钧儒、郭沫若、邹韬奋等知名人士带头签名，最终有各党派、各界人士 184 人名列发起人名单。

在推举保育会会长时，开始大家提议由德高望重的孙夫人宋庆龄担任，恰在此时传出有国民党特务要在保育会成立大会上捣乱的消息。邓颖超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和更有利于工作，委托史良、刘清扬、沈兹九三人去请宋美龄出面领导保育会。宋美龄欣然同意，同时提出将保育会隶属于她所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系统。于是后来保育会的正式名称即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一般通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sup>①</sup>因后来各地成立有分会，此时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又称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

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圣罗以女中举行，妇女界、中外来宾等 700 余人到会，安娥做筹备工作报告。宋美龄致词，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拯救难童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 56 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会后宋美龄与邓颖超会面，表示愿为拯救难童而真诚合作。3月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了 17 名常务理事：宋美龄、李德全、黄卓群、邓颖超、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孟庆树、张蔼真、陈纪彝、郭秀仪、唐国桢、舒颜昭、任培道、徐闾瑞、陈逸云；5 名候补常务理事：徐镜平、刘清扬、庄静、吕晓道、朱纶。后来在 9 月中旬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宋美龄、李德全被一致推选为正、副理事长。为争取多方支持赞助，扩大影响，保育会还

<sup>①</sup> 李文宜：《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片断回忆》，《李文宜纪念文集》第 248—249 页；邓颖超：《继承和发扬抗日烽火中育才的光荣传统》，《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第 4 页。

聘请了 286 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如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孔祥熙、宋子文、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郭沫若、陶行知、茅盾、老舍、蔡元培、晏阳初、胡适、陈嘉庚、胡文虎;斯诺、史沫特莱、司徒雷登、鹿地亘等。

保育会成立不久,即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筹建了临时保育院,李昆源出任院长。陆续有 500 余名从前线抢救来的难童进入保育院。5 月 1 日上午,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周恩来等参观了保育院,蒋介石并发表了讲话。

### 筹款和抢救转运难童

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章中第七条说明经费来源是:1. 请求党政机关补助;2. 捐募。保育总会在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征募组。在抗战的艰苦时期要筹措一大笔款项很不容易。保育总会的理事们和工作人员不辞劳苦,积极奔走,通过各种形式多方募集。《妇女生活》5 卷 11 期刊出“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发表了宋美龄、李德全、史良、郭秀仪、杜君慧、沈兹九、曹孟君、胡兰畦等人宣传儿童保育事业,呼吁各界为保育会捐款的文章,还登出保育会委托生活书店代理募捐的启事。

时任总会常务理事、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郭秀仪回忆:“从 3 月 11 日起,在武汉掀起了颇有声势的为拯救难童的募捐和宣传活动,我主持了汉口的献金台。蒋夫人和保育会的同仁带头捐献,蒋夫人认捐 26000 多元和负担 2549 名儿童的常年生活费(每个难童每年生活费当时约为 60 元),冯夫人李德全女士捐款 2500 元,负担 511 名儿童的常年生活费。我捐了 2 万多元,负担 442 名儿童

的常年生活费。保育会的常务委员张蔼真、唐国祯、安娥、沈兹九、邓颖超、刘清扬等都捐了款，有条件的也承担了几名到几十名儿童的常年生活费用。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救济战争难童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那些天，担任经委会主任的冯夫人和我，找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官要员们和企业家、银行家们，募集了不少的经费。冯玉祥先生的女儿冯弗伐小姐帮助她妈妈往来于汉口、武昌之间，到处找人捐款。”<sup>①</sup>

但是保育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在海外。总会在1942年儿童节之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两万多个儿童的教养费是从何处来的呢？我们首先要向蒋夫人和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人致敬。四年来直到现在，除去一小部分外，主要的也是大宗的教养经费，是由蒋夫人向海外募集来的。不用说，这笔款项是多少人血汗所凝成，由于他们爱国的热诚，才使这件工作能继续不断的推动。虽然，由于国际情势的转变，这个来源是逐渐的少了。”<sup>②</sup>大量的海外募集，支持了保育会的发展，这里仅举几例：1940年底，菲律宾著名华侨“木材大王”李清泉逝世。“其家属以其遗产一部十万美元捐助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又马尼拉公共团体及李氏友人，为纪念李氏起见，将再募四十万美元，捐助难童，送交蒋夫人收。”<sup>③</sup>1941年秋，美国红十字会向保育总会捐赠了40吨蓝、白布，总会用这些布匹给各保育院的保育生添置了外衣两套、棉衣一套、背心一件、夏衣两套和被套半个（两人合用）。<sup>④</sup>这件事情给保育院师生印象

① 郭秀仪：《我与抗战时期的儿童保育会》。《流金岁月——郭秀仪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工作中的教与养》，《妇女新运》第4卷第4期，1942年4月。

③ 《难童教养》第1卷第9期，1940年12月。

④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深刻,这批美国捐赠的布就被称为“罗斯福布”。1945年3月,美国妇女服装业联合工会捐助直属第十一保育院(励新建设学园)1000万元建成新校舍,又出资750万元,作为院务发展之用。<sup>①</sup>随后保育总会即以该工会会长杜宾·思克之名改励新建设学园为思克职业学校。

政府方面也给予保育会一定补助。从1939年2月起,财政部按月补助保育会3万元,由振济委员会拨发。至9月份又增至6万元。<sup>②</sup>到了1941年1月,每月补助款又增至40万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爆发后,保育总会海外援助受限,同时物价米价上涨。各保育院深感困难,向总会告急。保育总会请求政府予平价米供应。行政院令振委会在重庆卫戍区“范围以内之各难童教养机关,其难童及员工所食米粮,每石市价值超过六十元时,其超过之价额,得按月造具清册送由该会核发米粮救济金,所有此项米粮救济费,并准由该会呈请专款拨发”。<sup>③</sup>到1942年春季,川、渝、黔各保育院食用平价米基本解决。1943年春,各保育院再次面临粮价波动。行政院即“通过难童生活改善办法,决定政府经营之难童事业机关,儿童之主食物一律发给平价米,每人市斗二斗二升;副食物包括盐,煤,肉,菜油,均定量发给实物”。<sup>④</sup>

各保育分会、院还努力争取直接募捐。香港经济地理环境优越,香港保育院“主要由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厂、商、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好人士捐赠。所得的捐款和用品除自用外,还有多余的上缴保育总会,另外,我们的生活费用还由香港

① 《大公报》1945年3月11日。

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民国二十八年大事记》,《保育生通讯》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

③ 《行政院训令 勇字 8250号》,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一六全宗,1320卷。

④ 《大公报》1943年5月24日。

保育分会和妇女会发起各界认养；当时，保育生中要算香港保育生的物质生活最丰富。衣服、床上用品、日用品、学习用品等全部由厂、商提供”<sup>①</sup>；1938年9月四川分会“经与盐务总局朱体仁总办数度接洽，结果盐务局方面允领养难童二千名，所有经常及开办经费，概由四川省盐务公益捐经费项下拨用，本会只任输送及监督之责，以后五通桥、自流井两院经费即由盐务局负担”。<sup>②</sup>1939年2月湖南分会第三保育院在沅陵建立，“经费完全由湘岸盐务办事处协济委员会公益费项下拨给……”<sup>③</sup>盐务局承担这三所保育院的经费，给总会工作以很大的支持。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物质条件艰苦。经费虽有总会拨付、边区政府补助和一定捐助，仍面临诸多困难。保育院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开展生产。“小学部的儿童除学习以外，还参加生产工作：开荒、种地、种菜、缝纫、编织等……去年开荒生地十垧，收获糜子三担，种了三、四亩地的菠菜、白菜、萝卜，此外还收获洋芋三千多斤，养猪十余口；女生的缝纫编织都有很好的成绩，同时为了节约经费，全体学生（除低年级外）自己学会编制草鞋。生产所获丰余，儿童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之下，都拿来改善生活了”。<sup>④</sup>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院简章中第四条规定：“儿童资格：1. 阵亡将士之子女。2. 抗战将士之子女。3. 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4. 做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5. 战区灾童。”战区灾童即难童

---

① 高伟林 张大慈：《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保育院始末》，《保育生通讯》1997年第2期。

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概况》，第36、37页，1938年10月1日。

③ 《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第三保育院二十八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一六全宗，1309卷。

④ 吴平：《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中国妇女》（延安）第1卷第10、11期，1940年。

一直是各保育院保育生中的主体。保育会成立伊始,即着手抢救收容从沦陷区流浪过来的难童。邓颖超动员组织“武汉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抗战儿童读书会”、“孩子剧团”等组织在武汉街头和难民收容所进行宣传,收容无人或无力抚养的难童送往临时保育院。<sup>①</sup>保育会常务理事、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于1938年3月中主持保育人员训练班,不久即率领首批工作队奔赴开封,短期内即收容近400名难童,带领他们于3月底顺利返回汉口。<sup>②</sup>4月中,曹孟君和冯光灌、陈茵、张刚等几位女同志再赴前线,到台儿庄、徐州一带抢救难童,这次她们屡遭险境,最后在徐州城内被困八昼夜后,于5月14日仅带领10名难童随突围士兵冲出徐州城。<sup>③</sup>6月,曹孟君又一次率队赶往孝感,抢救因遭日机轰炸而逃亡的难童。另一支抢救工作队由唐国桢、徐镜平带领,于4月24日出发,到达开封后经五、六天的艰苦努力,从敌机的轰炸下抢救收容400余名难童,乘火车返回汉口。<sup>④</sup>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形势紧张。保育会开展新一轮工作,抢救抢运难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孟庆树8月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加紧抢救儿童——为抢救一千个儿童而斗争。”至8月底,保育会又收容了1300多名难童。

由于战争形势和条件所限,汉口临时保育院基本上属于中转站的性质,不断有难童进来,又不断转移到更远的大后方去。第一批被转移的50名难童由保育会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刘清扬带队,于

---

① 沈兹九、罗叔章、季洪:《在抗日烽火中培育民族后代》,《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第14页。

② 林震声:《抢救难童到开封》,《保育生通讯》1996年第3期。

③ 沈兹九、罗琼、左诵芬:《深切怀念曹孟君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1月6日。

④ 唐国桢:《第一次抢救难童》,《战时儿童保育》第1期(1938年12月),《保育生通讯》1966年第3期。



4月底送至湖南芷江孤儿院。<sup>①</sup>6月保育会在长江航运要地宜昌设立运接站,负责转运各保育院送来的难童,宜昌盐务局长的夫人方雪琼医生出任站长,保育总会派徐镜平前往协助工作。7月又在万县、巫山增设了运接站。<sup>②</sup>此后的两年时间,宜昌运接站进行了十分出色的工作。首先要安置好源源不断转来的难童,为了安全,运接站尽量把难童安置在英、美、法等国在宜昌的教堂、学校、医院等地,然后再设法尽快运往重庆。武汉沦陷后,运接站又主动去沙市一带抢救流落的难童。参加抢救工作的还有保育会候补常务理事吕晓道,以及当时吸收的一批爱国青年如杜子明、龚沉思、甘守镛等。当宜、沙局势暂时稳定一些时,运接站又到襄樊前线抢救儿童,并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积极支持。“总计以宜昌为据点,抢救儿童在千名以上”。<sup>③</sup>

其他在宜昌的抗敌救亡组织、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也都积极参与抢救转运难童,宜昌运接站的所在地英国教会学校哀欧拿女中更是全力以赴。学校当时的有利条件是,在校内屋顶上都画了英国国旗,得以免遭日机轰炸。1936年起任校长的刘自铮后来回忆:“哀欧拿女中组织了接待站,腾出了部分房屋接待过境的难民和难童。老师和高中学生都投入了接待工作。特别是从各地运来的难童6到14岁的居多数,除了到码头上、船上接送难童,替他(她)们洗澡、洗衣,以及准备膳食之外,还要为他们上课,组织他们学习。如果遇到雨天,哪怕是六月三伏天还要生火,为难童烤干湿衣,让他们穿干衣上船去四川。在一年多时间里,哀中接待难民难

① 刘清扬:《赴芷江途中》,《妇女生活》第6卷第2期,1938年5月。

② 沈兹九、罗叔章、季洪:《在抗日烽火中培育民族后代》,《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第15页。

③ 徐镜平:《回忆战时儿童保育会》,《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第244-245页。

童数以万计。由于哀中接待工作做得较好,当时宜昌地方当局曾传令嘉奖。”<sup>①</sup>

武汉会战期间,众多单位的设备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伤兵、难民、难童涌入宜昌,而入川运力十分紧张,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难童滞留现象,保育会宜昌运接站和其他救助机构时常要与各轮船公司打交道,协商请求尽快运送难童。时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坐镇宜昌,指挥抢运人员物资。从保存下来的1938年11月6日宜昌运接站致卢作孚信函中,可以看出当时运接站救助难童的急迫心情。信中说:“兹因时局益紧,空袭频仍,本站滞留宜昌儿童尚有千余之多,早经蒋夫人向各方呼吁,请予协助。风闻军事当局以时局紧张,拟将船只加以统治之说,果属确实,则千余难童均将无以运送。素仰次长热心公益,拯救难黎极具热忱,用特函请次长查明,准予商饬航政当局,在每次船只上驶时,酌予加运难童若干名,俾千余难童得达安全区域,皆次长之赐也。临颖不胜迫切待命之至……”<sup>②</sup>经各方努力,至12月初“滞宜难童已全部运送出境”。<sup>③</sup>1940年4月15日,由于日军向鄂西进犯,保育总会决定结束宜昌运接站的工作。两年间,宜昌运接站“共接运和抢救儿童在1.5万以上,基本上胜利地完成运送任务”。<sup>④</sup>

## 各保育分会和保育院

1938年10月23日,在武汉守军撤退的前两天,保育总会带

① 刘自铮:《哀欧拿女子中学五十年》,《宜昌文史资料》第5辑,1986年。

② 《卢作孚书信集》,黄立人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0-721页。

③ 《大公报》1938年12月3日。

④ 徐镜平:《回忆战时儿童保育会》,《抗日烽火中的摇篮》,第244-245页。

领最后一批难童登船离开武汉, 抵达重庆后继续开展工作。1939年10-11月, 总会增补吴貽芳、钱用和、董燕梁、谢兰郁、张郁真为常务理事, 刘清扬、徐镜平、庄静、吕晓道、朱纶由候补常务理事升为常务理事。

从1938年春到1941年秋, 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了11所直属保育院。1938年5月在重庆陕西街万寿宫建立了又一所临时保育院, 接收转运难童, 杜君慧、汪学箴、王慧一、刘全英、田素云先后任院长。1940年10月重庆临时保育院改为收容站, 由李淑言任主任。<sup>①</sup> 1938年11月, 保育总会委托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在均县成立了一所保育院。1939年4月中, 罗叔章院长根据总会指示, 带领几百名师生长途转移, 4月30日抵达重庆。5月8日转至新址江北大田坎, 随后保育总会将均县保育院改为直属第一保育院。1939年底, 直一院又迁至合川元门镇。1939年10月罗叔章院长辞职, 此后杜贵文、吴静怡先后任院长。1942年春末, 保育总会解散直一院, 349名保育生转到其他各保育院。<sup>②</sup>

1939年5月, 保育总会将1939年2月在江北县金剑山建立的保育院改为直属第二保育院, 汪学箴、段超人先后任院长。1942年夏总会解散直二院, 341名保育生转到其他各保育院。<sup>③</sup> 6月总会直属第三保育院在江北县土主镇建立, 直到抗战胜利保育院工作结束, 院长始终由赵郁仙(赵君陶)担任, 先后培养800多名保育

① 《战时儿童保育会民国二十九年大事记》,《保育生通讯》1994年第1期。

② 直一院纪念册编委会:《艰苦的历程》,《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一保育院纪念册》第39-51页,1998年。《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③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生。<sup>①</sup>6月总会直属第四保育院在璧山县八塘镇建立,傅岩、黎书言、徐振扬先后任院长,保育生最多时有500余名。<sup>②</sup>9月总会直属第五保育院在璧山县大路场建立,系由迁川的湖南第二保育院改建。总计培养保育生700余人,院长始终由曹克勋担任。<sup>③</sup>9月总会直属第六保育院在永川县淞溉场建立,冯质慧、齐笑尘先后任院长,1942年6月直六院撤销,217名保育生转其他各保育院。<sup>④</sup>9月总会直属第七保育院在南川县田家乡建立,夏一之、杜彦桐先后任院长。总计培养保育生500余人。<sup>⑤</sup>9月,由武汉基督教会举办的“宜昌美华儿童保育院”,在万县李家河文家坪改建为保育总会直属第八保育院,燕重子一直任院长,1943年2月时有保育生354名。<sup>⑥</sup>

1940年4月,总会在江北县悦来场建立直属第九保育院,彭训任院长。1941年10月直九院解散,200多名保育生转到其他直属各保育院。<sup>⑦</sup>1941年秋,总会直属第十一保育院在江北县董家溪建立,唐子清任院长。1943年10月,直十一院改为励新建设学园,实行半工半读,唐子清任园长。1945年春,励新建设学园再改为思克

---

① 《赵君陶同志生平简介》,《慈母般的爱——赵君陶同志和战时儿童保育院》3-4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② 黄金山:《我的保育生活——回忆直属第四保育院》,《摇篮》1995年第1、2、4期。

③ 韩浩若:《巴山蜀水宝光情——直五院院史》,《保育生通讯》1996年第4期。

④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⑤ 《直属第七保育院大事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史料选辑(1939.7-1946.6)》86-91页,直属第七保育院院史编委会、四川南川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1994年。

⑥ 《战时儿童保育会民国二十八年大事记(续)》,《保育生通讯》1996年第一期。《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⑦ 邹立群:《哭彭训妈妈》,《摇篮》1995年第1期。

职业学校,张远定任校长,1945年9月时有保育生107名。<sup>①</sup>

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成立后不久,各地分会和保育院相继建立,接收总会转来的难童和流落到本地的难童。各分会一般是由当地行政首长的夫人出面主持,由妇女界、教育界、宗教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负责具体工作。

1938年4月4日,江西分会在南昌成立(后迁至泰和),由17人组成常务理事会,傅以睿任常务理事会主席。顾柏筠、蒋方良、王杰仪、劳君展、熊芷、雷洁琼、朱剑华等任各委员会主任。5月1日,江西分会第一保育院在南昌建立(后迁至永新),熊珍任院长,不久陈庆云接任。1943年2月时有保育生497人。1940年7月7日,江西分会第二保育院在赣县建立,蒋方良任院长,1943年2月时有保育生380人。<sup>②</sup>

4月22日,广东分会在广州成立(后迁至曲江、兴宁),上官德贤、伍智梅、吴菊芳、雷励琼、王孝英、邓惠芳、吴珣等十六人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吴菊芳、雷励琼、王孝英三人为驻会常务理事。分会相继建立了6所保育院,林苑文、潘锦瑞、黄传朴、雷励琼、刘绮文、陈崇龙、李世鉴、徐惠仪、刘嘉彤等先后任各院院长。因战争形势,各保育院多次迁徙,几经撤并,至1945年9月时有4所保育院,1525名保育生。<sup>③</sup>

① 胡吉成:《关于思克职业学校的点滴回顾》,《保育生通讯》1995年第2期。《本会暨所属各院员生人数表(194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② 朱剑华:《一年来的江西保育工作》(1939),《保育生通讯》1997年第1期。《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③ 杜永强、李静英、张韦:《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广东分会简史》,《保育生通讯》1998年第1期。《本会暨所属各院员生人数表(194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4月24日,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后迁至重庆),王俊英、张维桢、葛成慧、赵懋华、赵铁玫、赵淑嘉、邓季惺、黎剑虹、谭惕吾等15人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分会相继建立8所保育院,赵懋华、曹孟君、汪树棠、章文、蒋鉴、胡惇五、杜君慧、赵筱梅、朱涵珠等先后任各院院长。后几经撤并改建,1943年2月4所保育院有保育生1889人。<sup>①</sup>

5月10日,香港分会成立,理事会由53人组成。何香凝、胡木兰、何艾龄、王孝英、许畹君、招若兰、廖梦醒、伍艳庄等为常务理事,宋庆龄、宋霭龄、张乐怡等为名誉理事。分会短期内先后建立3所保育院,院长均由何艾龄担任。1939年底,3所保育院合并迁入香港侨商胡文虎兄弟捐助的新址,全体师生近600人。1940年5月,香港分会奉总会令,开始向内地转移,至1940年底,绝大部分保育生先后分三批到达贵州。总会将香港分会、保育院并入贵州分会和保育院,香港分会和保育院的工作结束。<sup>②</sup>

5月14日,福建分会在福州成立(后迁至南平),选出了监事会,理事会。监事长为陈月芳、李雄。林知渊、王世秀、唐守谦、陈陶心、陈叔圭、陈佩兰、翁侃等20人为理事。王世静任理事长,李黎洲、董广英任副理事长。不久在建瓯建立第一保育院,陈瑞玉任院长。1943年2月时有保育生349人。<sup>③</sup>

5月22日,贵州分会在贵阳成立。理事会成员由28名理事和9名侯补理事组成。李宗恩、王敏仪、冷仲赤、保志宁、袁愈荧、

① 《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概况》,1938年10月1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② 《申报(香港版)》,1938年5月11日。高伟林、张大慈:《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保育院始末》,《保育生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福建民报》,1938年5月15、17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郭昌鹤为常务理事,保志宁、陈适云先后任理事长。分会相继建立了四所保育院,后来并为三所。陈坤、王逸秋、杨书琴、赵仲玉、李坚白、朱涵珠、王恒良、谷炳仑先后任各院院长。1943年2月时共有保育生852人。<sup>①</sup>

5月22日,广西分会在桂林成立。理事会成员有郭德洁、马佩璋、周淑兰、谢兰馨、刘尊一、沈慧莲。分会相继建立了三所保育院,1940年3月时有保育生872人。1943年4月合并为广西第一保育院。刘尊一、阳永芳、宋淮、韦燕章等先后任各院院长。1944年6月,日军迫近广西,省政府发出第一次桂林紧急疏散令。保育总会决定撤销广西第一保育院,260多名保育生8月初转移至贵阳,多数安置于贵州第一、第二保育院。<sup>②</sup>

5月29日,成都分会在成都市成立。理事会成员有吴贻芳、郝映青、钟殊漪、陈翠贞、王枫、陆秀、范寓梅、杨芳、岳宝琪、郭凤鸣、王敏仪等人,吴贻芳任理事长。分会相继建立了四所保育院,后经撤并剩一所。黄达贞、卢怡超、王中惠、张芸芳、陈瑾瑜、王俊如、贺哲仁、杨芳、钟昭华、陈肖松先后任各院院长。各院总计教养保育生1400名以上。<sup>③</sup>

6月5日,浙江分会在金华成立(后迁至云和)。蔡风珍、李家应、沈清珪、彭惠秀、黎沛华、萧、戚铮音、贵曦兰等15人为理事会理事,蔡风珍任理事长。分会建立了两所保育院。第一保育院长期由李家应任院长,有保育生700多人。第二保育院院长一直由

① 《贵州晨报》,1938年5月23日、6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② 《摇篮》编辑部:《广西第一、二、三保育院的成立、合并与撤销》,《摇篮》2000年第1期。

③ 阙海源、吴德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都分会暨所属保育院简述》,《保育生通讯》2000年第1-2期合刊。

戚铮音担任,保育生多时近400人。<sup>①</sup>

6月5日,湖南分会在长沙市成立(后迁至桂东)。张默君、洪希厚、张素我、曾宝荪、刘舜华、徐舒、王浣青、龙慕兰等15人为理事会常务理事,张默君、洪希厚为常务理事会正副主任。分会相继建立了5所保育院,几经迁徙撤并后剩两所。夏景陶、刘辅同、倪家骏、黄湘、齐新、丁维柔、项维贤、李融中、梁正先后任各院院长,各保育院先后共有保育生2000多名。<sup>②</sup>

7月4日,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成立。康克清、蔡畅、张琴秋、徐明清、史秀云、杨芝芳、丁玲等17人为理事会理事。徐明清、杨芝芳、李芝光、吴瑛、刘秀梅、诸友仁、李玉亭、吴文瑜、江兆菊等9人为常务理事,杨芝芳任会长。10月2日,分会建立了第一保育院,陈碧如、李芝光、陶汲波、丁彤、凌莎、黄杰、杨芝芳先后任院长,1940年3月时有保育生331人。1939年2月保育院小学部分出单独办校,吴燕生、梁金生、郭青先后任校长,1943年初有学生637人。<sup>③</sup>1945年6月第二保育院建立,张炽昌任院长。至1946年11月时有保育生136人。<sup>④</sup>

8月8日,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儿童保育会在西安成立。理事会成员有124人,省主席蒋鼎文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是王普

---

① 许为通、严金明《浙江第一儿童保育院概述》,孔昭锐:《浙江第一、二儿童保育院点滴回忆》,《革命史资料》第16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49-166页。

② 刘建本:《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湖南分会简史》,《保育生通讯》1999年第4期。

③ 高耶夫:《儿童保育事业的辉煌光彩——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保育院、保育院小学部的开创和演进》,《保育生通讯》1996年第1期。

④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院史编写小组:《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1-34页,北京市教育局幼儿教育研究室出版,1981年。



涵、王友直。<sup>①</sup> 11月在西安建立第一保育院,后迁至岐山县,王秀清任院长。保育生多时达500人。1939年5月,经与保育总会的沟通协商,陕西保育会归保育总会管辖,为总会的分会,总会拨发经费并予以指导。<sup>②</sup> 1940年4月,陕西第二保育院在西安成立,皮以书任院长。1943年两院合并,1945年9月时有保育生437人。<sup>③</sup> 1943年初大批河南灾民涌入陕西,2月保育总会在宝鸡设临时保育院,由陕西分会管理,专收河南来的难童。姜漱寰任院长,1945年9月时有保育生500人。<sup>④</sup>

1940年2月10日,山西分会在陕西三原县成立,徐兰森任理事长。同时成立第一保育院,吕清夫任院长,1943年底有保育生246名。4月,第二保育院在陕西宜川县成立,后迁回山西吉县,张维溪任院长,1943年底有保育生254名。<sup>⑤</sup>

1941年3月11日,晋察冀分会和保育院成立。分会委员会由31人组成,刘光运、大田、刘仁、刘素菲、宋子纯、江一真、田益等7人为常委。不久召开常委会推定刘素菲为主任,刘光运为副主任兼保育院院长。保育院接收父母均为抗战军政干部而因工作无力照管的子女和抗战烈士的遗孤。保育院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管理”办法,保育儿童分散在农村各保姆家中,由5—7人组成小组,小组长负责检查督促。因战时艰苦环境等原因,保育院只接收了

---

① 《西京日报》,1938年8月9日。《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章程及保育院简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一一六全宗,1309卷。

② 皮以书:《陕西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三月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妇女新运》第3期,1939年6月。

③ 《本会暨所属各院员生人数表(194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④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年来的工作》,《妇女新运》第6卷第6期,1944年6月。

⑤ 《新华日报》1940年2月18日。《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各院院址及儿童人数一览表(1943.2.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一全宗,544卷。

20多名保育生。<sup>①</sup>由于时值皖南事变不久,国共关系紧张,晋察冀分会和保育院未能得到重庆保育总会的正式承认和经费补助。后来部分保育生辗转至延安,入延安保育院。

除以上分会外,安徽分会于1938年5月1日在六安成立,理事会成员有王立文、张淡如、胡子婴、李文宜、任之、孙以瑾、何宝霞。分会建立了一所临时保育院,王立文任院长。但因各种原因,分会和保育院维持未久即告结束。上海、山东、宁夏、甘肃、西康、云南以及远在印尼的望加锡,也都建立了保育分会。但是这些分会只是从事宣传和募捐工作,没有组建保育院。

另外,保育总会还有4所保育院和两处所属“代养团体”,即由总会交付一定数量难童给这些单位,经费由这些收养单位自筹和保育总会补助共同解决。计有由抗日烈士刘湛恩的遗孀刘王立明为纪念丈夫,于1939年4月创办的湛恩难童教养院,位于四川宜宾,院长为曹凤翔,保育生最多时有100余人。<sup>②</sup>基督教会上海伯特利孤儿院在贵州独山、毕节建立了两所保育院。时庚明、林景康、鄂恩普、郭耀西先后任院长。1943年初两院有保育生200余人。<sup>③</sup>在湖南湘西,代养团体有养园战区保育院,芷江孤儿院和芷江天主教堂,所收难童都不多。<sup>④</sup>

在严酷的战时环境下,各保育院在创办和开展过程中,大都历尽艰辛,迭遭磨难。1939年春末日军逼近鄂西北,直一院500多名保育生在罗院长带领下,半个多月跋涉千里,由均县转移至重庆,刚刚抵达,就赶上日机5月2日、3日对重庆的大轰炸。所幸

① 《晋察冀日报》1941年3月18日、29日,4月1日,7月29日。

② 段文苑:《我的人生起点——回忆湛恩难童教养院》,《摇篮》1995年第2期。

③ 刘伍福、张天文:《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独山分院简史》,姚德珍、徐明瑛、詹方海、张天文:《我们在伯特利保育院毕节分院》,《保育生通讯》2001年第3期。

④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保育生们没有伤亡,躲过一劫。1938年9月浙江第一临时保育院的303名保育生奉总会之命西迁至湖南,到达湘西大庸并入湖南分会第二保育院,由于院长黄湘任人唯亲,管理不善,保育生病亡不断,引发恐慌气氛。直到1939年9月湘二院再次西迁至重庆璧山县何家沟,由总会派来的曹克勋接任院长改建为直五院后,情况才有根本转变。1940年5月中,因形势危急,香港保育院据总会指示开始向内地疏散,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保育院师生先后分三批穿过粤、桂两省,直到1941年元旦才全部到达贵州桐梓。迁徙途中,时遭敌机轰炸,亦有饥寒交迫,险象不断。广东的各保育院经历了两次大规模转移,第一次是在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后,刚成立的粤二院即由广东四会西迁广西,12月底到达宜山。1939年2月又有200多名保育生转至贵州。1939年4月粤一院从香港转移至粤北连县。第二次大转移是在1944年夏长衡战役至1945年1月底,日军攻陷广东临时省会韶关后期间。粤四院由乐昌迁至南雄;粤三院由乐昌迁往江西信丰,又迁回广东和平;粤二院由连县迁往南雄,再迁至五华;粤一院由连县迁至五华。每次转移,都是千里行军,穿山越河,时遇凄风苦雨,病饿交加,各保育院师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度过了难关。同样在日军大举进攻长沙、衡阳时,地处衡阳东部的湖南第二、四保育院,在齐新、李融中两位院长带领下,于1944年底撤退至湘东南的汝城,1000多名保育生转危为安。江西第一保育院在陈庆云院长带领下先后转移到拿山和永平。而广西第一保育院根据总会指示在桂林就地撤消解散,总会特派总会教育指导、北泉慈幼院院长周之廉赶赴桂林,带领260多名保育生于8月初撤退至贵阳,避免了后来可能遭遇的更大灾难。

后来的衡阳教养院就没有如此幸运了。衡阳教养院属于振济委员会系统,1944年6月开始转移,由于组织不力,动作迟缓,以

后被迫分散行动,各自为战,被裹入难民流。在半年多的苦难之旅中,不断有学生死于轰炸、疾病、劫掠、溺水和各种事故。1944年12月,攻占贵州独山的日军,残忍地将100多名未及撤走的衡阳院伤病学生活活烧死。1945年1月,幸存的同学终于到达了重庆。出发时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三四百人。正如衡阳院同学自己所述:“死散十之五六,就是幸运逃到重庆的,也是九死余生,受尽了人间的艰苦。”<sup>①</sup>这是抗战时期拯救难童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保育总会海外援助受困。总会在12月12日召集临时常务理事会,决定:“一方面设法开源,一方面设法节流,在节流上急应执行的是:节省各院一切不必要的经费,儿童人数不足之院,应予以合并。”经过努力,到1942年中,“保育院是相当的紧缩了,从数量上说,六个院被并以后,原有四十五个院遂减为三十七个院。不能并的,像各分会所属的院也都能领悟本会并院的意旨而实行紧缩,或是请有能力的家长将儿童领回自养,或则严令停止收容。再从管教上说,并院的儿童大致得依照性别和年龄,予以调整划分,因之管教上比以前便利了。进度也比较的迅速了。院的经费也得到相当的节省……”<sup>②</sup>

抗战胜利后,保育总会在工作总结中写道:“本会成立之初,正当敌人疯狂轰炸之时,各城市及各沦陷区儿童亟待救济,本会同仁不顾炮火危险,至各沦陷区抢救流离失所之儿童,运送后方安全区域。八年以来,共收容教养儿童二万九千四百八十六名。”“儿童送至安全区后,即在各适当地区,设立学校兼家庭式之保育院,予以教养。自廿七年起,共成立保育院四十七所,后因节省经费及事

① 《游子录》,国立十一中学南岳衡阳教养所同学会刊印,1946年5月。

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实需要,裁并若干院,今尚存保育院二十九所及疗养院一所。”<sup>①</sup>

## 保育生的保育和培养

难童进入保育院,命运开始改变。而保育院首要的工作也是要使保育生能够健康地成长,这在抗战时期艰苦条件下,实为不易。保育总会成立之初,经费标准是每名保育生每月教养费5元。随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素和实际需要变化,到了1945年底,每名保育生的每月费用已升至4200多元。而各地生活水准,各保育院管理水平和直接捐助情况的差别,导致各地区的保育院差异很大。如在香港保育院,“早餐:每周有牛粥、花生粥、糖粥、米粥、牛奶轮换进餐。中晚餐每人一碟菜肴,除供应充分的蔬菜外,还搭配有鱼、肉、蛋。除此外每周供应一次预防暑病的凉茶、一次预防香港脚的红米饭,以及一次牛骨汤和水果。”<sup>②</sup>1940年底,香港保育生陆续疏散至贵州,成为贵州院的保育生。而贵州保育院的伙食是:“常吃西红柿(二分钱一斤)、米豆腐、青菜、萝卜等菜,有时还打牙祭。偶尔买不到食盐,不免要吃餐淡菜。保育生每人每天的定量粮食是24两大米(老秤一斤半),根本吃不完。”<sup>③</sup>

除了衣食,医药卫生条件对保育生的健康成长也至关重要。保育总会迁到重庆后,“承卫生署的帮忙,协助我们成立了四川分会及直属各院的医疗室。但是因为药料的缺乏,甚至无法购买,同时医务人才也非常缺乏,要请一位医生或是看护都不是容易的事。

① 《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年来工作总报告(1945)》,《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② 高伟林 张大慈:《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保育院始末》,《保育生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李坚白:《青岩保育院琐记》,《保育生通讯》1996年第4期。

已经成立了医疗室的各院,孩子们是一天天的向健康的路上走的,病孩子一天天在减少,有些院已经减少到百分之三四。当然有很多院是做不到的……”<sup>①</sup>在保育院老师和医护人员的细心治疗下,多数进院时长着“癞痢头”,满身疥疮虱,面黄肌瘦的难童,变成了清洁健康的保育生。

保育生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大多数处于小学教育阶段。总会“所辖各保育院都是依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四二制办法施教,所用的课本也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sup>②</sup>总会对保育生的教育非常重视,宋美龄和李德全均有过多次指示。总会在1939年的工作报告中说:“我们不单是养活这两万难童,我们更要给他们以教育,使每一个孩子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使他们成为建造新中国的匠手。但是,保育院不和学校相同,我们只采用普通小学的方法是显然不够的,所以许多新的方法,都在各保育院中实施。本会自己编的‘抗战建国读本’,已陆续分发给各院使用。”<sup>③</sup>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主持制定了“教导实施大纲”。其中提出“对儿童施行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启发儿童爱国思想与发扬民族精神之教育”。各保育院对保育生讲述祖国历史,宣传当前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爱国主义教育很自然地在保育生中产生共鸣,因为在难童时期,他们大都有着家破人亡、四处流浪的惨痛经历,保育院的教育使他们更加仇恨侵略者,立志长大成才报国,报答保育院的养育之恩。

很快,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在1943年底的学生从军热潮中,有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踊跃报名,投笔从戎。当年参

---

① 《五个月来的战时儿童保育》,《妇女新运》第3期,1939年6月。

② 言心哲:《现代社会事业》,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91页。

③ 《五个月来的战时儿童保育》,《妇女新运》第3期,1939年6月。

军的保育生原因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从驻印军中看，全部或大部都是保育生的连队——被誉为‘保育生连’者就有好几个。仅笔者所在的战车第七营第一连就有二十多人，占全连四分之一……1944年11月又陆续从军的很多，以致教一团一营三连成了青一色的十五中同学，号称‘小鬼连’……而一营一连则是青一色的十六中同学……缅北、滇西战场上，学生军（含保育生）中英勇顽强，奋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层出不穷，俯拾即得。”<sup>①</sup>原因列举了川二院的梁守义，吴山基，叶本会，川七院、十五中的徐行仕等人的英雄事迹，他们是民族的骄傲，保育生的光荣。

不少难童在流浪中形成孤僻、暴躁性格，心理抑郁，行为散漫、顽劣等，而对这样的“问题儿童”，各保育院的院长老师花了许多心血，在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直三院院长赵君陶总结出九条“实施办法”：1. 示范；2. 暗示；3. 赞扬奖励；4. 不当众责备；5. 尊重儿童能力；6. 预防和减少犯过的机会；7. 避免偷窃，事先调查给以适当满足；8. 反省；9. 情感的联络。每一条下都有论证，还介绍了不同类型孩子的教育转变情况。<sup>②</sup>各院还利用每年一次的院长会议和其他机会报告工作，交流经验，提高改进。

除了正规的文化课程，各保育院都很重视生产劳动教育。“各地保育院都设有小规模农场和工厂，儿童分别参加农事、畜牧、纺织、缝纫、竹木藤工艺、装订印刷，以及运输等工作。大部分能

---

① 原因：《青史流芳 苍天可鉴——略述抗日学生远征军及其保育生的抗日业绩》，《摇篮》1996年第2期。

② 赵君陶：《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员工作资料》，《慈母般的爱——赵君陶同志和战时儿童保育院》，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3页。

做到蔬菜自给,衣服鞋袜自制,簿册自行制订,并藉劳作生产以改善儿童自己的生活。保育院劳作教育的开展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由于一部分儿童已经到了可以劳动的年龄,而他们的出身大半是劳动大众的子女,懂得而且习惯劳作的。第二,保育院的现实环境与经济困难迫逼儿童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改进自己的生活。第三,是试行了‘做上教、做上学’的实用教育原则。于是,十岁以上的儿童,大都参加了一种或几种的劳作,贡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同时,在劳作中,也获得了更丰富更切实的学问”。<sup>①</sup>

保育生在保育院完成小学教育后,根据保育总会与教育部商定的办法,“经过考试,成绩好的准许升入指定的国立中学,师范学校或各种职业学校。成绩次的,便送他们到各工厂去习艺”。<sup>②</sup>保育生可以升入的国立中学包括:川境内的国立二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二中、十五中、十六中、十七中、十八中,黔境内的国立十四中,湘桂粤三省境内的国立十一中。1942年10月又在湖南芷江增设国立二十中。关于中学生费用负担,保育总会与教育部洽商决定保育会“负担中学生费用到初中一年级为止;从初中二年级以后,保育生的费用,便改由教育部负担”。<sup>③</sup>另外,位于成都的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也招收保育生,费用由川康盐务局负担。

十五中和二十中都是只招收保育生的中学。1944年夏,十五中第一届初中生毕业,但因经费困难无法升高中。教育部与保育总会商定,改十五中为国立荣昌师范,由教育部负担在校学生费用。与此同时,二十中由于屡被敌机轰炸和遭到土匪劫掠,于

① 海宇:《八年来儿童保育工作的检讨》,《现代妇女》1946年第1期。

② 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工作中的教与养》,《妇女新运》第4卷第4期,1942年4月。

③ 《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



1944年8月由芷江迁至贵州玉屏,其中高中部并入湖南永绥国立八中,女子部迁往贵州桐梓并入国立女中。1945年春由直十一院改建的思克职业学校是保育会唯一的职业学校,下设建筑、农艺、财会三个组,教会保育生生产和职业技能。另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新型学校——育才学校,也一直从保育生中招生,使得具有某方面才能的保育生能够在良好的环境中继续学习发展。

1945年底,由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社邀请二十多位保育工作者座谈八年来的儿童保育工作,总结文章中说:“如果总计一下八年来的保育工作成绩,则在儿童保育总会收容的29751个儿童中,升学的有5160人,习艺的1862人,至三十三年底止,除家长领回外,在院教育者尚有9023人;所有这些儿童,不仅保全了生命,大体上说,并且培植成为有用的人,这总是一件大功绩。受过教育以后,保育院的儿童大都可以说是坚强、能干,能够代表新生的一代的儿童的。”<sup>①</sup>做出这“一件大功绩”的,正是保育会的不平凡的女性,从总会到分会和各院,尤其是各保育院的院长和老师(也包括少数男院长和老师)。正是她们不畏艰难,为国分忧。虽然只取微薄的薪酬,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慈爱之心拯救抚育了数万难童。她们中的杰出代表蒋鉴,曾参加救护伤兵工作,忘我服务,被誉为“伤兵之母”。后出任川五院院长,对保育生细心呵护,疼爱有加,又被誉为“难童之母”。不幸积劳成疾,于1940年10月5日辞世,噩耗传来,川渝悲恸,各界痛悼。保育生们对抚育他们成长的院长老师永远感恩在心,视同她们为自己的妈妈。

1945年10月10日至12日,“中央日报”刊登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人员颁授胜利勋章的名单,其中属于(包括列名和兼职)战时儿童保育会有72人。

<sup>①</sup> 海宇:《八年来儿童保育工作的检讨》,《现代妇女》1946年第1期。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战时”已成过去,保育会开始着手复员工作,1946年2月制订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复员后建设计划”。直属各院和各分会院陆续展开工作。1946年9月15日至21日,保育总会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我会因抗战胜利,战时保育任务已完。半年来,本会及各分会除将有家之在院保育生及习艺生商经善后救济总署协助遣送还乡外,其无家可归者,已分别移交社会部各省社会处育幼院继续教养。关于升学保育生,有家者,亦已遣送回乡;无家者仍继续留川攻读。均由教育部负责公费供应到高中毕业。所办思克职业学校,已交重庆市政府接办。本会业于九月十五日结束,一切收支即行截止。特此公告。”

## 国共间的合作与摩擦

战时儿童保育会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但是这种合作一直是以特殊的形式进行着。在保育总会的常务理事中,公开为中共党员身份的只有邓颖超、孟庆树两人,但实际上常务理事中的安娥、曹孟君、徐镜平也是共产党员,没有暴露身份。另外沈兹九1939年加入中共,刘清扬是中共早期党员,脱党后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到各保育院一级,中共党员也占有相当比例。总会直属各院中,汉口临时院院长李昆源,直一院院长罗叔章,直二院院长段超人,直三院院长赵君陶,直六院院长齐笑尘,直九院院长彭训;分会各院中,川六院院长张杰人,川七院院长杜君慧,蓉四院院长钟少华,浙二院院长戚铮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至于各院教师中的中共党员更多,如直五院教师中有欧阳立安烈士的母亲陶承,孙炳文烈士的遗孀任锐;直一院教师中有恽代英烈士的遗孀沈葆英,徐向前元帅夫人黄杰。邓颖超回忆:“在国统区工作,无论哪一方面都是由南方

局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工作的。妇女工作也是如此,它是整个工作的一个方面,统一在南方局的指导下……”<sup>①</sup>总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民党党员有宋美龄、唐国桢、陈逸云、任培道、徐闾瑞、庄静、吕晓道、钱用和。张蔼真、陈纪彝代表基督教女青年会。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决定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共中央则以在国统区开展活动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隐蔽撤退”来对应。保育院的中共组织在这样的形势下继续工作。

国民党方面的嗅觉也是灵敏的。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记述:“何总长报告女共党在重庆之集中所,一为儿童保育院,一为妇女指导委员会。”“儿童保育会负责人李德全、邓颖超、张晓梅<sup>②</sup>等每月经费一百八十万元,各地儿童一万八千人,多在中共妇女把持中。”<sup>③</sup>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一些保育院被怀疑是“共党分子”的院长、老师遭排斥,被迫离开。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主要在川渝地区的一些保育院,又一批隐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上级指示相继撤离。而接踵而来的国民党背景的院长、教师和军事教官,对保育生实行高压管制,不许谈论国事,禁读进步书刊,有的教官对保育生打骂体罚,还发生贪污挥霍保育经费现象。且时常有特务搜查保育院,逮捕“嫌疑分子”。

国共双方在各保育院摩擦,保育会领导层是如何对待呢?副

---

① 《邓颖超致函郭建——谈战时儿童保育会问题》,《保育生通讯》1998年第1期。

② 张晓梅,中共党员,1939年从延安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组副组长,公开身份为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名誉理事,经常陪同邓颖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251页。

理事长李德全一贯支持鼓励保育院的进步力量,经常视察各院,帮助解决问题。而理事长宋美龄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对待保育会内共产党的问题上,宋美龄有着较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她当然希望保育会内国民党力量占优势,还曾亲自在总会内发展国民党员。<sup>①</sup>而另一方面,她也清楚地看到,凡被认为是由中共党员占主体的保育院,保育工作都十分出色,成果卓著,给保育事业带来声誉,她多次予以称赞。如对于直一院罗叔章院长和老师带领500多名保育生长途转移的事迹,宋美龄在1939年10月份举行的保育院长会议上予以表扬,说直一院立了大功。<sup>②</sup>被中共地下党员视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直七院院长杜彦桐,是经中共南方局安排来的,工作成绩优异。宋美龄为表彰直七院,于1942年元旦亲笔题写匾额“南州冠冕”。<sup>③</sup>曹孟君曾任院长的川一院,被誉为“模范保育院”,宋美龄和蒋介石来视察,陪同外宾参观,宋氏三姊妹还和川一院师生一起度过1940年的儿童节。<sup>④</sup>

唐纵在他194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记述:“下午联系会报,各方报告保育院为中共把握情形,决定请蒋夫人改组,并在各院成立三青团组织。”<sup>⑤</sup>目前尚无文献史料反映宋美龄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样的“改组”,也未见各保育院很有成效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的活动。时任保育总会理事、秘书处干事兼文书股股长的

---

① 1940年初,宋美龄让张霭真找总会理事赵一恒、金家骥等人,希望他们加入国民党。笔者2000年11月采访赵一恒,《保育生通讯》2002年第1.2期合刊。

② 直一院纪念册编委会:《艰苦的历程》,《烽火摇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一保育院纪念册》,1998年,第48页。

③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七保育院史料选辑(1939.7-1946.6)》,直属第七保育院院史编委会,四川南川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1994年版,第81页,46页。

④ 王国桢 马建德 欧阳群:《模范保育院——川一院》,《保育生通讯》1995年第4期。

⑤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56页。

赵一恒回忆：“后来一到开会讨论经费的事，几个国民党人就拼命吵，说是不能给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了。宋美龄不表态，别人也不敢做声。我不管，不怕鬼神，我脑子精明，拿出记录说，每三个月发一次经费，凡是保育院，都享受平等待遇，坚持要给边区保育院经费。张霭真、陈纪彝支持我，以后就一直给了下去。”<sup>①</sup>可以看出，宋美龄在保育会后期历史中，并未明确反对中共，而是持一种中立的姿态，使得保育会的工作在一种相对均衡的氛围下继续下去。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情势下，保育总会坚持给边区保育院发放经费，实属不易。邓颖超1985年回忆：“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sup>②</sup>这是客观和公正的忆述。

(作者古为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李仲明)

---

① 笔者采访赵一恒,《保育生通讯》,2002年第1-2期合刊。

② 《邓颖超致函郭建——谈战时儿童保育会问题》,《保育生通讯》1998年第1期。